

有形之手能否根治银行服务乱收费?

——聚焦银行服务收费新规

□新华社记者 江国成 刘诗平 苏雪燕

随着部分商业银行违规向个人或企业客户乱收费屡屡曝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加大查处、整治力度,并于14日公布了规范商业银行服务收费政策措施。这些举措能否惠及城乡居民、企业,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能否根治广为诟病的乱收费?记者就此采访了发改委、银监会、专家学者和部分消费者。

新规给百姓带来什么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英说,社会上对有的银行收取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异地取现手续费问题反映较多。为切实解决退休职工的实际困难,保护其利益,此次明确免收个人基本养老金(含退休金)账户每月前2笔,且每笔不超过2500元的本行异地取现手续费。

同时,新规还部分免除了银行个人客户的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年费。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新规针对个人与企业经常需要使用的业务和具有争议的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短信通知费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并且尊重民意。

中国银监会创新部主任王岩岫表示,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代缴代扣代收代付业务手续费问题,《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要求不得向委托方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收取委托业务相关手续费。针对银行终止服务机制缺失导致有客户非自愿被扣费的现象,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要求及时终止相关服务。

他说,在增加服务收费信息透明度方面,新办法从信息披露渠道、告知义务、公示内

容、合同条款四个方面明确了管理要求,对强制客户接受服务并强制扣费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基本覆盖目前投诉反映较多的问题。

用“紧箍咒”遏制见利忘义乱收费

商业银行服务收费名目繁多,部分国有大银行收费项目高达400多种。由于收费名目多,不透明,一些银行客户抱怨一不小心就被乱收费。为此,两部公布了商业银行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目录,降低和调整部分收费标准,规定部分免费服务项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说,目前我国银行垄断比较严重,一些金融服务存在“霸王条款”现象。银行服务兼具“自然垄断”和“公益服务”特征,某些服务定价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应该适当引导和干预。

郭田勇认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确存在着收费项目较多、部分项目收费较高以及收费不透明等问题。

他认为银行收费问题争论的焦点费用高低只是一个方面,服务质量也是社会所关注的,银行收费要做到物有所值,这正是我国银行业的不足之处。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为主要盈利来源仍是利息收入,想要仅仅提高中间业务的手续费来增加收入是不可取的,应在中间业务的品种和品质方面增强竞争力。

银行收费谁做主?

商业银行服务收费是否应完全由市场说了算?政府出面规范是否有违法律和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雁北的回答是否定的。

她认为我国金融领域还不是充分竞争的

领域,因此商业银行与其交易相对人相比,还具有相对的经济优势。如果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损害了实质的公平和正义而市场机制本身又无法对其进行制约时,法律就需要对商业银行包括自主定价权在内的经营自主权进行必要的规制。

郭田勇说,市场定价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准确的,当出现收费不规范现象时,适度的政府指导价有助于保持价格的合理性。在银行业发展成熟的国家,许多中间业务都是免费的,如英国对跨行取款不收手续费。

孟雁北认为政府本次出台的政策已经尽可能尊重了银行的自主定价权,也尽可能发挥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为了尽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新规仅对柜台转账、取现手续费等13项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设定最高限价,并在适当降低收费标准的同时,对电子银行渠道提供的转账、取现手续费等数百项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增加服务收费透明度 引进外部监督

面对银行提供的数百种服务收费项目,许多消费者感到茫然,往往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就被不明不白宰一刀。

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刘先生反映,他曾经在华夏银行办理了一张白金卡,经办人员当时称免收年费。过了一年,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一年扣了我680元年费,很黑啊”。一位招商银行信用卡持有者徐先生曾为信用卡挂失付出了60元的手续费,感觉有点贵。

王岩岫说,为了保护银行客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等合法权益,《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包括了8条增强服务价格信息透明度的条

款。例如,商业银行应当在其营业场所醒目位置,设有网站的应当在其网站主页醒目位置,及时、准确公示有关服务项目、价格等信息;商业银行提高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应当至少于实行前3个月依规进行公示。新办法还鼓励社会力量等外部力量监督银行服务收费。

对此,中国银行财务管理部高级经理刘屏非表示,新办法很大程度让老百姓有办法了解到服务价格信息,使他们拥有选择权,还能满足银行市场化的需求。

郭田勇认为,外部监管力量的作用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强化有利于推动银行收费更趋合理化、规范化。但规范银行收费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进一步开放银行业、引进民间资本,让银行业充分竞争来实现。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治乱 新华社发 赵乃育 作

境界不高,用了集体的钱,还了就没事了”。还说“权力不用,过期作废”。

——相关立法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明确。陈卫东说,监督管理“村官”,相关的立法还存在缺陷。由于村级组织职能繁多,公务、村务、党务,难以区分,因而造成主体难分、罪名难定、管辖权无法明确的境况。

“防范‘村官’在土地上犯罪,首先就是要规范制度监督,让监管不再形同虚设。”于晓光说,应从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加强监督和管理,确保征地拆迁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对“村官”权力的行使进行监控,强化制约。

“应加大对‘村官’的教育培养,提高他们法律意识。”丁锡奎说,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群众赋予的,只能为老百姓谋利益,不应为自己牟私利。

陈卫东还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将重大事项申报等内容引入“村官”管理,构建起小“村官”、大“监督”体系,从而防范“村官”贪腐案件发生。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生财有“地” 新华社发 南海春 作

礼收礼在内的各类违纪违法行为,必须保持高压态势,针对新情况,不断出重拳。

遏制“灰色”送礼,还应清除法规上的“灰色地带”。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表示,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古玩字画等艺术品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对“雅贿”的惩处乏力。纪检人员在查处“雅贿”时,常常也面临取证和评估难题。遏制送礼歪风,应从法规制度上明确“节礼”和“受贿”的边界。

一些专家提出,可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不正当收入”的界定,尽可能穷尽对“受贿罪”的物品列举,“雅”“俗”同治,防止“灰色礼品”逍遥法外。

“四风”之弊由来已久,反四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送礼方式越来越隐蔽,既反映出“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多来成效显著,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反腐的长期性、艰巨性。这其中既有文化因素,更有权力寻租。

“从根本上遏制‘节日腐败’,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规范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保障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王忠武说。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改头换面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新华社记者 周婷玉 张乐 沈洋 李亚红

国务院医改办近日给出的最后时间表:今年6月底前所有省份要启动大病保险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份、130多个城市开展了大病保险试点。城乡居民从中获益几何?试点的全面推开,能否为因病致贫画上“句号”?

大病面前,现有医疗救助制度“杯水车薪”

国务院医改办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27个省份开展大病保险试点,覆盖城乡居民2.9亿人。而截至2013年8月底,大病保险已累计补偿金额6.3亿元。

大病保险试点始于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下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从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基金中切出一部分,为大病患者提供“二次报销”,以防“因病致贫”。

尽管我国新农合和基本医保已实现全民覆盖,但因筹资和保障水平偏低,仍有不少家庭因灾难性医疗支出而陷入困境,以致出现“锯腿自救”、“刻章救妻”、“抢钱救儿”等现象。

浙江省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俞新乐说,从统计看,肿瘤、终末期肾病等需要长时间、且花费巨大的慢性恶性疾病患者,是致贫、返贫的主要人群。

在这些大病面前,现有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对患者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一方面资金微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市医疗救助支出超过49亿元,平均每人每次救助258元;农村支出83亿元,平均每人每次148元;另一方面,救助范围有限,医疗救助主要针对城乡贫困人口,而大病压垮的不仅于此,普通农民、城镇居民甚至职工都有可能“因病返贫”。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说,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这有利于筑牢群众看病就医托底救急的网底。

制度“碎片化”,试点推开捉襟见肘

当前,全国大病保险试点总体进展顺利。但由于地方政府的认识不足、部门职能调整不到位、城乡医保制度分离等原因,各地试点进度不一:个别省份尚未开展试点;已开展的省份中,大多是在局部试点,有些还是在部分县(区)层面自行试点;有的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已推开,而新农合则刚刚起步。

各地制度设计也是“五花八门”。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王琬说,她参与中国保险学会最近组织的大病保险调研时发现,20多个省份的试点有20多个方案,省与省之间、省内各地市之间,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都存在差别。“这将影响大病保险政策的全面推开”。

统筹层次参差不齐。吉林、青海、甘肃、山东4省是省级统筹,大多数试点地区是市级统筹,还有个地区是县级统筹。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说:“以县为统筹单位与规定不符。保险是大数法则,统筹层次越低,风险承担能力就越弱。”

资金来源有远虑。六部委明确的是“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据了解,目前各试点人均筹资标准在10元至60元之间。有的是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的结余,有的则是从医保个人账户中释放,还有的将城镇职工也纳入大病保险扩大资金“储水池”。

“当前医保基金有一些结余,但今后应忧虑医保资金的支撑能力。”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由于老龄化社会疾病负担将增加,医保结余将越来越少,应探索科学的长效筹资机制,避免底线被击穿。

承办主体现恶性竞争。六部委规定,大病医保由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由政府招标选定,但仍有个别试点地区由医保机构承办。同时,一些地方出现保险公司间的恶性价格竞争。

王琬说,保险公司投标时应依据发病率、医疗费用、人口规模等综合因素作出科学测算,但由于缺乏基础数据、抢占市场一些公司报价走低。“这不利于行业发展,也不利于大病保险制度的稳定。”

提速,谨防过度医疗吞噬资金

资金是否安全、充足,决定着大病保险制度生命的长短。受访人士建议,大病保险试点全面推开过程中,应从筹资机制、基金安全等方面探索制度的可持续性。

建立科学长效的筹资机制。“基本医保的结余部分仅仅是风险基金,比例很低。大病保险仅靠此难以长久。”江西省人社厅医保处处长黄小刚说,亟需探索建立多渠道、可持续的大病保险筹资机制。江西在使用居民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同时,也利用统筹基金结余部分;对结余不足的地区,通过提高年度筹资标准时统筹解决。

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管,让大病保险基金用到刀刃上。“没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参与,医保资金很容易进入‘无底洞’。”国家卫计委医改司副司长姚建红表示,大病保险推进中,必须对过度医疗行为加强监管,防止各种不合理的利益团体侵蚀老百姓的权益。

如何把医保资金最有效地转化为合理的医疗服务?饶克勤建议,可以大病保险为契机,探索建立第三方支付方与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的谈判机制,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

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的监管,建立合理公平的风险共担机制。大病保险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有助于减少“人情支付”等现象,不当医疗行为,降低医疗费用。

浙江省保监局副局长刘钢表示,政府在招商保机构时不能单纯看给出的价格,还要看其网点、保障的及时性等服务水平。同时还要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对于出现的问题,如保险公司不能及时按照承诺兑付,必须严厉处罚;对于考核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或进行退赔赔偿。而政府部门也要给保机构预留适度的经营空间,切实落实“保本微利,共担风险”原则。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适度扩大大病保险的目录范围,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大病保险政策设计的根本目标。按现有政策,大病保险保障的范围与基本医保一致。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何文炯说,这意味着,大病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保报销比例过低、起付线过高、封顶线过低等问题,很多新农合或基本医保过去无法报销的内容,如今仍然没法报销。

如罕见病戈谢氏病患者,每年需要医疗费用200万元,但其所需药品没有列入医保目录,基本医保能报的不足百元,大量费用只能依靠自己家庭负担。这样的患者是因病致贫群体中的重要部分。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新型城镇化:谨防“村官”成“硕鼠”

□新华社记者 周立权

新型城镇化建设,绕不过的就是征占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村官”俨然成了“土地财神”,借机坐地生财。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不断曝出“村官”贪腐大案,且手法不断“推陈出新”。

小“村官”常常涉大案 背后都有土地的影子

吉林省长春市打造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征地时涉及的二道区泉眼镇、劝农镇相继出现“村官”集体贪腐案件,其中岗子村居然后有三任村支书、两任村主任、三名具体负责征地拆迁的村工作人员受到查处。

这些人或因贪污国家征地补偿款、或因非法转让土地获利、或多报被占土地骗取国家补偿款而犯罪。

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近期一些地方不断曝出“村官”贪腐大案,也多与土地有关。

海南省海口市5名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占土地的职务便利,侵吞村民征地补偿款近1300万元,近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对主犯无期徒刑的判决。

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家产过亿,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坐地生财,近日被深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涉嫌收受贿赂5000多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拆迁和项目开发提供帮助所得的“好处费”。

“村官”虽小,却大贪频出。广州市因此要求“村官”护照统一上缴,对村官实施出国审批管理。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锡奎说:

“被占土地村的‘村官’,就像‘土地财神’,他们‘前仆后继’犯罪,小小‘村官’竟成了高危职位。”

围绕土地“做文章” 敛财手段不断翻新

记者调查发现,“村官”们为了让土地生钱,手段不断“推陈出新”:

——“私占存储”法。

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反贪局李玉玉介绍,岗子村原村支部书记于生以政府征地名义,提前低价从农民手中骗得土地,留存在自己手里,等政府真正征地时获取高额补偿款,赚取巨额“差价”。

——“虚报征占”法。

于生将村里19200平方米耕地,以村里存放农用机械用地名义,报请镇政府予以征收,骗取土地补偿款96.5万元,而村民根本不知情。

——“张冠李戴”法。

二道区检察院反贪局调研员马亭山说,虚列拟拆迁物,用“张冠李戴”法也可骗取巨额补偿款。于生勾结测绘人员,将集体土地虚设在村民王某等3户村民名下,“套”取土地补偿款83万元。

——“抢栽抢建”法。

长春市二道区英俊镇,泉眼镇有5个“村官”带头,在将被征收的土地上盖大棚、种树,向政府伸手要补偿。

——“贿上瞒下”法。海南省海口市的“村官”,先以办理征地手续为名,骗得村民代表签字,再向海口市国土部门干部行贿244万元,使各监管关口道失守,最终村民近1300万征地补偿款被5名“村官”中饱私囊。

——“证假提成”法。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3名“村官”一面协助政府征地,一面又帮助承租人用假证“套”取巨额补偿,收受“提成”

1500余万元。

专家提醒,“村官”在土地犯罪上的新手段,值得高度重视。

完善监管机制 切断坐地生财路

一些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村官”虽地位不高,但却是最经常、最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人。他们的犯罪很大程度损害了政府形象,滋生了公众的不信任情绪,腐蚀执政根基,令人担忧。

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及于晓光等专家认为,“村官”频频倒在土地上,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村官”监督失控,监管缺失。于晓光认为,政府对农村征地补偿款的发放,使用缺少必要的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督和跟踪不到位。有时仅凭“村官”一枚公章,就办理了拨付手续,且很多单据都是“白条”,为不法“村官”犯罪提供了便利。

——“村官”法律意识淡薄,整体素质偏低。李玉玉介绍,在她参与查办的案件中,“村官”大多年龄偏大且文化程度较低,对相关法律法规认识模糊,基本的法律常识缺失。

岗子村原主任张某,是公认的“老好人”,在多起案件中,他都在涉案的审批表、虚假协议、证明上签字。提审问他:“你知你的签字意味着什么吗?”他回答:“村民办事不容易,书记让我签我就签了……要知道犯罪,我说什么也不签。”

岗子村原主任杨立财用征地补偿款支付出国考察费用,审他时,他认为“自己只是

“廉节”新风里的灰色角落

——节日高档礼品“改头换面”追踪

□新华社记者 凌军辉 李放

严令之下,马年春节新风扑面。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高档礼品销售明显下滑,福州多家商场超市的高档礼品酒销量同比下降七成左右,洛阳一些零售企业的高端烟酒销量同比下降近四成。

但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高档烟酒“改头换面”,节日送礼方式更隐蔽,一些浪费腐败依旧在“廉节”的灰色角落潜行。

名酒乔装成礼品 极品烟里藏“茅台”

为应对中高端酒销售下滑趋势,五粮液、茅台等酒企已正式推出或正酝酿推出“私人定制”业务,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包装,单次购买最低额度一般在10万元左右。

知名酒企开拓市场的新举措,却给春节送礼提供了便利。

“酒瓶上只有一个‘酒’字,不要编号,不要品牌,瓶子也是最普通的,但价格并不‘普通’。”在郑州经商多年的罗老板春节前从贵州茅台镇以及河南的多个酒厂“私人定制”了20多万元“简单包装”白酒,每瓶价格从三四百元到上万元,除了节日送礼,主要是给相关部门和业务单位的领导送礼。

“这种酒表面看不出价钱,但喝酒的人都知道肚明。”罗老板说。

贵州的白酒销售商陈经理告诉记者,受多重禁令影响,企业、单位订制酒业务急剧萎缩,一些有送礼需求的企业、个人转而通过“私人订制”业务购买“简装”名酒。“私人订制白酒方式更隐蔽,市场可能迎来井喷”。

除了改换包装,一些很少在市场上流通

的极品烟也成为送礼的“新宠”。贵阳一家烟酒店的老板小王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春节送礼流行一种叫“国酒香”的烟。

“烟嘴里面有一颗蓝色的小珠子,里面是30年的茅台酒,抽之前把小珠子挤碎,酒香四溢。”王老板说,这种烟2300元一条,市面上几乎买不到,只有通过熟人才能拿到货,“过年前要的人多,必须要提前预定。”

事实上,国家烟草局几年前就明确要求,所有卷烟品牌规格的零售指导价均不得超过1000元/每条(200支)。为了满足高档礼品烟的巨大需求,一些烟草公司想了很多新点子。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含有茅台酒,一些特殊香烟还含有人参、冬虫夏草等高档中草药提取物。这些极品香烟价格高昂,且销售渠道隐蔽、不易识别,春节期间销售火爆。

北京一家内蒙古特产专卖店的老板说,普通的冬虫夏草烟每条价格1000元,而几乎不在市面流通的铁盒包装大约2600元一条。“年前备了一批货,如今都卖完了。”

旅游“偷梁换柱” 春联“暗藏雅贿”

春节全家出游本是团圆欢聚的高兴事,然而一些人送礼也在这方面打起了歪主意。“公司今年在海南,在这边度假的五星级酒店以开年会的名义预定了不少房间,都是用来搞接待的。领导消费后以公司名义买单就行,我们最后一起结账。”西南一私营矿场老板说。

近年来不少“落马”官员与“出游腐败”有关。2013年7月,贵州省安顺市原市长王木君被实名举报。举报人称,2012年接待王木君与其家人在三亚过春节,7天花费超过30万元。目前相关部门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随着“出游反腐”监管力度加大,不少地方都要求领导干部出行必须汇报,并提供住宿发票等证明。但上述矿场老板透露,公司会在同一时间以领导的名义在经济型酒店也订上房间。“事后领导把便宜酒店的发票拿回去就行了。”

除了变相逃避节日旅游监管,春联、年画等家家户户最常见的过年民俗也成为送礼的新花样。

在河南经营古玩字画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前,许多老客户委托他找一些书画名家写春联或者年画。“买方主要是经商的老板,一般都是春联都不落款,但有些会有名家印章,大部分都是拿来送人。为了满足客户需要,我还专门去西安找名家求了两副春联。”

“一副春联的价值根据作者名气从几千元到十余万元不等,而且越放越值钱。”

张先生说。

有法律专家指出,由于相关法律没有对古玩字画等艺术品的行贿受贿进行明确规定,近年来“雅贿”有所抬头。这种借春联、年画等年俗为名,行“雅贿”之实的行为则更加难以界定,易成监管盲区。

歪风“高一尺” 监督“涨一文”

专家认为,禁令高压之下,马年春节党风政风整体上明显好转,但在一些灰色地带,高档烟酒“改头换面”、送礼花样翻新值得警惕。

歪风“高一尺”,监督应“涨一文”。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表示,一些企业老板认为反腐是暂时的,一阵风,但关系是永久的,需要不断经营。有些人对党内反腐的预期不明确,存在侥幸心理。因此,治理包括送